

漢晉文化地理

盧 云著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 文化、文化地理与历史文化地理	(1)
(二)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现状与意义	(3)
(三) 课题内容与研究方法	(6)
第一章 汉晋时期学术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变迁	(1)
第一节	(2)
一 西汉文化发达区域的基本格局及其地理基础	(3)
二 西汉前后期文化发达区域的成长与变迁	(12)
三 西汉学术文化的区域构成与区域特色	(40)
四 西汉时期的文化重心与文化传播	(50)

第二节	(63)
一 东汉时期的文化发达区域	(64)
二 东汉政治形势与文化发达区域的 变迁	(76)
三 东汉经学的传播与区域文化特色 的减弱	(80)
四 东汉学术文化向边远地区的拓进	(82)
五 东汉时期文化重心的转移	(88)
第三节	(98)
一 东汉末年的士人流动与荆、幽、 辽东、岭南短暂的文化繁荣	(99)
二 三国时期的文化发达区域	(103)
三 西晋时期的文化发达区域	(113)
四 三国西晋时期学术文化的地域差别	(124)
五 三国西晋时期的文化重心	(133)
第二章 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 浪潮	(143)
第一节 滨海地带的地理环境与早期宗教 传统	(144)
一 滨海地带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144)
二 滨海地带东夷、吴越各族的原始 崇拜	(147)
三 滨海地带华夏族早期的宗教传统	(149)
第二节 滨海地带的方士文化及其传播	(152)
一 燕齐滨海地带方士文化的渊源与 崛起	(153)

二	燕齐滨海地带方士文化的发展与 兴盛	(159)
三	方士文化的传播与区域分布	(165)
四	方士文化的衰退与区域遗存	(181)
第三节	滨海地带的谶纬神学及其传播	(187)
一	燕齐滨海地带谶纬神学的渊源与 兴起	(189)
二	燕齐滨海地带谶纬神学的早期发 展与传播	(200)
三	西汉哀、平以后谶纬神学的兴盛 与区域传播	(205)
四	三国西晋时期谶纬神学的衰退与 区域遗存	(216)
第四节	滨海地带的早期道教及其传播	(227)
一	青徐滨海地带早期道教的渊源与 兴起	(228)
二	三国西晋时期早期道教的传播与 区域分布	(237)
第三章	汉晋时期婚姻形态的地理研究	(251)
第一节	西汉时期燕、赵、郑、齐等地 的婚姻习俗及其分布变迁	(253)
一	燕地的“借妻”婚及其分布变迁	(255)
二	赵、中山、郑地的“奔婚”及其 分布变迁	(262)
三	郑卫地区的“男女聚会”及其分 布变迁	(268)

四	齐地的“长女不嫁”之俗及其分布变迁	(278)
五	从西汉各地残存的古老婚俗看华夏族婚姻形态的历史变迁	(287)
第二节	汉晋时期婚姻礼制的地域扩展与阶层传播	(294)
一	先秦时期的婚姻礼制及其流行范围	(297)
二	西汉时期婚姻礼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传播	(305)
三	东汉时期婚姻礼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拓展	(311)
四	三国西晋时期婚姻礼制在南北方的衰退与扩展	(326)
第三节	汉晋时期周边民族的婚姻形态与习俗	(345)
一	岭南越人的族外群婚	(346)
二	高句丽的走访婚	(348)
三	乌桓人的服役婚	(349)
四	乌桓、鲜卑的掠夺婚	(349)
五	北方诸族的收继婚	(350)
六	沃沮的买卖婚	(352)
七	男女聚会	(352)
八	女淫而妇贞	(353)
第四章	汉晋时期的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	(358)
第一节	先秦音乐地理概述	(360)

一	“变风变雅”与早期音乐区域的形成	(361)
二	先秦俗乐区域及其风格特征	(365)
三	先秦雅乐中心及其影响	(377)
第二节	两汉的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	(386)
一	两汉俗乐区域的分布格局与风格特征	(388)
二	两汉雅乐中心的转移	(412)
三	两汉边疆民族地区的音乐文化及其特征	(415)
第三节	两汉音乐文化地域风格的成因分析	(429)
一	自然环境与音乐文化	(430)
二	士民风气与音乐文化	(432)
三	婚姻习俗与音乐文化	(435)
四	宗教活动与音乐文化	(437)
五	城市发展与音乐文化	(439)
第四节	从两汉至魏晋音乐区域的变更	(443)
一	两汉时期各地俗乐的上升与区域特征的减弱	(445)
二	两汉时期雅乐的流布与音乐面貌的变迁	(450)
三	三国西晋时期音乐区域的新格局	(454)
四	三国西晋时期的雅乐中心	(474)
结束语	汉晋时期的文化区域及其变迁	(483)
(一)	西汉时期文化区域的分布格局与基本特征	(483)

(二) 东汉时期文化区域的整合与演变	(487)
(三) 三国西晋时期文化区域的再分化	(492)
附表 (表1—表15)	(496)
后 记	(564)

序

《汉晋文化地理》一书是卢云同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现在正式出版了，我感到很高兴。这是国内第一部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专著，作者的创造性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已受到十余位参加答辩与评审的专家学者的热情赞许与肯定。作为导师，我仅想在这里谈两个问题：一是开展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二是如何把历史文化地理搞上去。

历史文化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文化发展的地域特征极为显著，历史文化资料之丰富，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无与伦比的。照理，这门学科早就应该发展繁荣起来，但遗憾的是，它却长期处在极度薄弱的状态。在二三十年代，曾有丁文江等三几位学者粗略地摸过学术文化地理与人才分布，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特别是建国后的很长时期里，这类研究竟无嗣响。近年来港台和海外一些学者陆续作了新的努力，不过虽有开拓之功，难免粗略之病。为什么建国后大陆的历史文化地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呢？这存在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建国后，我国学科结构长期深受苏联四十年代旧体制的影响，地理

学仅被分为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两大部类，而包括文化地理学在内的其它人文地理内容均被取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化地理的发展自然难以受到重视。同时，在长期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历史学研究的重心也一直集中在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政治史、经济史与农民战争史等方面，某些传统文化有时还被视作封建主义的精神产品，除了泛泛地予以批判之外，很少有人愿意对文化的演变过程，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地域差异作较深入的研究，因为这是相当冒险的事。从主观上说，文化地理研究对资料的要求较高，包括纵向的不同时代的材料与横向的不同地区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往往相当分散，需要做一番艰苦的爬梳工作。这也使许多同志对此缺乏兴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上的左倾禁锢得以解放，社会科学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可喜局面。在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相继重建的同时，人文地理也再次受到重视与承认。但是在历史地理学内部，由于长期偏重于历史政治地理、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等方面，历史文化地理一时还拿不出具有足够份量的成果来。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同样在历史学领域，近年来虽然形成了一股经久不息的“文化热”，但文化研究中也普遍存在着忽视地域性的倾向。举个例子来说，自五四以来，不少人认为，中国文化，至少汉族文化，主要就是孔子思想与儒家礼教。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即便是汉族区域，也从来没有形成过纵贯各个时代、广被各个地区的同一文化，儒家学说始终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分地域分阶段的具体分析，也构成文化史研究中极待加强的一环。

卢云同志经过前后六年的努力，不仅对汉晋时期学术文化区

域特征进行了广泛探讨，而且把宗教文化、婚姻文化、音乐文化等也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以一种新的角度，展示了对汉晋社会与文化的更细致、更透彻的再认识。在研究方法上，卢云同志也作了不少可贵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该书可以说开拓了历史地理的一个新领域，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并且对文化史研究也有所裨益。

历史文化地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认真予以研究。但是，该怎样把这门学科搞上去呢？我认为，首先，要注重基础性的工作，那就是：广泛占有原始资料，努力理清基本事实。乾嘉学者在经学、小学、史学方面的成果之所以迄今仍还被徵引、被重视，原因就在于他们所从事的是基础工作。现在有些同志做学问，不肯先下功夫做基础工作，就急于找规律，建立体系或模式，这不是牢靠的办法。当然我并不是说规律与体系不重要，但这是较高层次上的工作，没有扎实的基础就谈规律与体系，无疑是空中楼阁。卢云同志在搜集、排比、分析及统计处理资料方面应该说是下了很可观的功夫，这是此书能够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文化地理学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文化现象本身上，还必须与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自然地理密切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份正确的历史时期的政区地图，就无法确切地进行文化要素的区域统计，更无法制出文化分布图来。同样，如不了解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类型，对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兴衰变迁也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只有对历史时期各类地理要素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此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成果与方法，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也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目前正在准备组织力量，对当代文化区域进行实际考察与问卷调查，预计这一工作会大大推进文化地理的研究。

卢云同志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汉晋时代的主要文化形态作了较系统的探讨，这为以后各阶段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卢云同志也有志于继续一段一段地搞下去，这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投身于这一领域，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原到边疆，把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文化面貌理清楚，把文化区域的历史变迁搞明白，这样，科学的历史文化地理学一定能建立起来，整个中国历史地理学也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谭其骧

1988年5月

绪 论

一、文化、文化地理与历史文化地理

什么是历史文化地理？它的学科性质如何？研究对象是什么？具有哪些主要特征？与相关学科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什么是文化与文化地理谈起。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众多学科普遍使用的概念。在国际国内学术界，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界说。

在我国古代，文化一词起源很早，指“文治教化”之意^[1]。西方文化一词出自拉丁文“Cultura”，原意为耕作，引伸至人们培育、创造、发展起来的与天然状态有别的事物。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是由英国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根据德国学者古斯塔夫·克勒姆的《文化学通论》发展而来，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指出：“文化或文明是一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而获得的能力与习惯。”在这里，泰勒已把文化作为一个综合体，但还局限在精神文化方面。后来美国的一些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在泰勒阐释的基础上，增加了“实物”，即物质文化的内容^[2]。自本世纪

以来，随着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迅速发展，文化的界说日益增多。据克鲁伯与克拉克洪的统计，从1871年至1951年，文化的定义已达164之多〔3〕。此后更不断有新的定义涌现。这些纷杂的定义，主要是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不同表述方式对文化加以不同的解释，但总的说来，仍不出泰勒关于文化是一复杂整体这一基本观念。

在我国，自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始，梁启超、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已开始对文化概念加以阐释。至三四十年代，随着西方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传播，文化研究逐渐深入，许多学者力图对文化作出明确的概念与分类，为此做了大量工作〔4〕。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文化研究长期受到冷落。近年来，从史学界反思传统文化开始，至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的再建，文化研究呈现出一股热潮。自然，文化是什么？又首先引起人们的关注，各种阐释纷纭而出，不过基本上均未超出国际学术界的界说范围。

大体说来，文化内容可分为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两大部分，它包括历史与现实中人类思想、风俗、生活方式、物质目标的创造与积累，以及对自然与社会极为复杂的适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文化则应是全部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成果与结晶。

人类文化与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任何文化的创造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空间范围，受到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构成人类环境的人为部分。因此，作为从空间角度与人地关系上展开的文化研究，文化地理学理所当然地发展起来。

文化地理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的科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相当丰富，主要

包括文化景观的形态描述与成因分析、文化源地与文化传播、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文化区域的划置、结构与变迁等。

文化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各类文化现象的地理特征，无不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探求历史时期文化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述当代文化景观与文化区域的历史成因，这就是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文化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又被视作文化地理学中的一个分支，从理论上说，现代文化地理的一切研究对象，也都是历史文化地理的课题内容。

但历史文化地理所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文化环境，具有本身的特殊性，因此，它事实上与当代文化地理还是有着不少差异。就研究手段而论，当代文化地理主要依靠大量的调查、统计与观察；而历史文化地理在注重实地考察的同时，对古代文献资料的研究也具有突出的地位。古代文化面貌的复原离不开文献记载，即使是实地考察的资料，也需用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就研究对象而论，当代文化地理虽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但侧重点在物质文化方面，诸如民居、道路、田野、服饰等，都是文化景观的重要表征。而历史文化地理更多的偏重于精神文化，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民俗等，这一方面因为古代文化景观历经沧桑变迁，不易复原，而精神文化则通过文献资料较多地保留着；另一方面，在人类文化遗产中，精神文化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然，随着整个科学事业的进步，历史文化地理在研究手段上会不断进步，研究领域也必将日益扩大。

二、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现状与意义

在国际学术界，历史文化地理已经历了长期的酝酿与发展。自文化地理研究开始起步时，历史文化地理的探讨也就出现了。

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德国地理学大师洪堡与李特尔曾就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宗教与民俗的起源、传耕等作过描述。拉采尔最早使用文化景观的概念，他的文化景观亦表述为历史景观。美国地理学家D.S.惠特尔西还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提出文化景观的“相继占用”概念。美国文化地理学大师C.O.索尔在本世纪初，曾努力使文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学中独立出来。此后文化地理学发展更为迅速，语言、宗教、音乐、美学等方面的地理研究日益丰富，而这些研究都与历史文化地理密不可分。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开始引进计量等新的科学方法，并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相互渗透〔5〕。

在本世纪上半叶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中，英国传播学派、德国文化圈学派与美国文化历史学派也十分注重文化的空间分布与区域联系，对文化传播与文化区域曾做过大量研究。美国学者威斯勒等人建立了“年代与区域假说”，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为此作过重要说明。此外，林托恩阐述过“边缘遗存”的设想，埃里克逊论证了与此密切相关的动态文化、离心文化的概念〔6〕，这些课题实际上也应是历史文化地理的内容。

那么，我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状况如何呢？这里不妨做一简略回顾。在建国前，能够称得上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论文仅寥寥数篇，如丁文江《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线啸筠《清代学者之地理分布》等〔7〕，而且这些研究都还比较粗浅。此外，还有一批关于地方或地域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如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文人》、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史念海《秦汉时代关西人民的尚武精神》等〔8〕。这类论文涉猎领域较前者为广，有些质量也很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发展更具有促进意义。

建国后，受苏联学科结构的影响，包括文化地理学在内的人文地理学被经济地理学所取代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也被取消，长期无人问津。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导致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长期中断，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形成了一块明显的空白。近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复兴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需要，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开始了新的起步。谭其骧师在1986年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一文^[9]，在与会代表中引起热烈反响。这篇论文高度概括了二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域特征，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周振鹤、游汝杰对中国历史方言地理的研究，也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果^[10]。

近年来，港台地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也有所发展，如严耕望《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一文，系统阐述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流行地域及各地文化的发展状况^[11]。陈正祥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与《中国历史与文化地理图册》，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作了广泛的研究^[12]。虽然他所论述的方志、城市、黄河、运河、黄土高原、地名等都已形成或归属于其它独立学科，在内容上也不免过于粗略，但陈氏开创之举，功不可没。

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也有不少研究，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在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中，涉及到历史文化地理内容。这方面以前田正名《河西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一书为例，作者在分析河西地区政治、民族、农业、商业、城市、人口等地理分布状况的同时，对该地与西域、长安的文化交流，该地的音乐、舞蹈等作了详尽的论述^[13]。另一方面是在史学的研究中，对某些地域文化特征的探讨。如胜村哲也关于东汉

知识分子地域差别与自律性的研究，就颇具新义^{〔14〕}。不过，在日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专门之作尚不多见。

总之，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在海内海外虽已取得一些成绩，但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大多数方面都相当薄弱，甚至空白，非常缺乏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对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与丰富历史遗产的我国来说，是极不相称的。加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探求历史时期各地区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与相互关系，不仅对历史地理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大有裨益，对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同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课题内容与研究方法

在我国现存唐代以前的古籍中，有两份系统的民俗文化地理资料，即《汉书·地理志》“风俗篇”与《隋书·地理志》“九州风俗概述”。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区域体系，全面论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学术文化、宗教信仰、婚丧礼俗、士民风气、农商好尚等文化总貌。本文就是从这两份资料的研究开始的。1982年，谭其骧师在授课中指出：如把《汉书·地理志》“风俗篇”与《隋书·地理志》“九州风俗概述”加以比较，阐明汉魏南北朝各地区文化的变迁，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受此启发，笔者即着手于这方面的探索。当时是以复原汉魏南北朝的文化区域为主旨，首先以《汉书·地理志》“风俗篇”为纲，用疏证的形式，爬梳经史诸子，遍检文集金石，将各种资料分门别类地会聚在“风俗篇”各条之下。

完成初步资料工作后，笔者感到，文献中反映出的各地民俗文化方面的内容，远远超出《汉书·地理志》“风俗篇”的概括范围，并且具有鲜明的分布特征。在进行文化区域的综合研究之